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配套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

第三版

下册

主编 朱栋霖 朱晓进 吴义勤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
面向 21 世纪 课程教材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配套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1917—2013

第三版

下册

主编 朱栋霖 朱晓进 吴义勤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内容提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也是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配套教材，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最具全国性影响的教材之一。本次修订，较深度更新百年中国文学史叙述，以新的文学观、文学史观重新阐释中国文学1917至2013年的发展。全书分为上编现代文学（1917—1949）和下编当代文学（1949—2013）。学术观点严谨、新颖，史料翔实，思路清晰，突出对经典作家和作品的解读。每章设“研习导引”，提炼重要的学术争论问题，供提升性学习。有关章节的知识点特设二维码，可链接教育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中国现当代文学/朱栋霖”课程相关内容。

本书作为高校中文、新闻、文秘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文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下册/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 — 3版.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04-040683-2

I. ①中… II. ①朱…②朱…③吴…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1917~2013—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6258号

策划编辑 于晓宁 梅咏
插图绘制 郝林

责任编辑 梅咏
责任校对 王雨

封面设计 杨立新
责任印制 田甜

版式设计 余杨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39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1999年8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3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24.2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0683-00

出版与使用说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第三版）是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文学”）的主教材。本教材以新的文学观、文学史观重新阐释中国文学 1917 至 2013 年的发展。上册为现代文学（1917—1949），下册为当代文学（1949—2013）。

本教材立足于本科教学，加强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研读。每章设“研习导引”，提炼重要的学术论争问题，供课堂讨论与教师指导学生提升性学习。我们旨在提供一个贯彻新世纪高等教学改革理念的新教材，提倡开放式、探究型的专业课教学，探索建构思考型、探究型、教学互动型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

本教材配有全套多媒体课件，供两个学期的课堂教学使用。各校教师可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联系索取（见书后“教师服务登记表”）。

考虑到各校课程设置情况的差异，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17—2013》（第三版）两卷本及四卷本配套出版，同时供各校选用。另有简编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精编 1917—2012》（一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编 1917—2012》（一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供非中文专业选用。

本教材在有关章节中特设二维码，可链接教育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朱栋霖”课程的相关资源，以拓展文学史教学内容，开阔学习视野。欢迎访问本课程的在线学习网站“爱课程”（<http://www.icourses.cn>），扫描封面二维码直达“中国现当代文学/朱栋霖”课程主页。

恳切希望各校同行教师在教学中积累丰富经验，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朱栋霖

2014 年 6 月 19 日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 58581897 58582371 58581879

反盗版举报传真 (010) 82086060

反盗版举报邮箱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务部

邮政编码 100120

高等教育出版社教师服务登记表

建设精品教材，向高校师生提供系列化教学解决方案和教学资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服务教育的重要方式。为支持本课程的教学，我们推出了本教材的配套教学演示文稿，由教材编写者精心编写，汇集了他们丰富的教学经验，供选用本教材的教师教学时参考。

为保证该服务仅为教师获得，烦请授课教师填写如下开课情况证明，我们将为您免费寄送教学课件。

我们的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21层 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事业部文科分社

邮编：100029

E-mail: meiyong@hep.com.cn

电话：010-58556274

传真：010-58581414

证 明

兹证明_____大学_____系/院_____级_____专业
_____学期（学年）开设的_____课程，采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_____
_____（书名和作者）作为本课程教材。授课教师为_____
学生共_____个班_____人。

授课教师需要与本书配套的网上资源和教学课件。

教师电话：_____

E-mail: _____

邮编和地址：_____

系/院主任：_____（签字）

（系/院办公室盖章）

____年____月____日

目 录

下编 (1949—2013)

第一章 1949—1976 年文学思潮	3
第一节 50 年代、60 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3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思潮	11
第二章 50 年代、60 年代小说	17
第一节 50 年代、60 年代小说概述	17
第二节 《创业史》《青春之歌》	24
第三节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	28
第三章 50 年代、60 年代诗歌 戏剧 散文	41
第一节 50 年代、60 年代诗歌概述 郭小川	41
第二节 50 年代、60 年代戏剧概述 《茶馆》	48
第三节 50 年代、60 年代散文概述	54
第四章 50—70 年代台港文学	61
第一节 台湾文学概述	61
第二节 台湾小说 白先勇等	64
第三节 香港文学概述	69
第四节 通俗小说 金庸	72
第五章 50—70 年代台港诗歌 戏剧 散文	80
第一节 诗歌 余光中等	80
第二节 戏剧	83
第三节 散文	86
第六章 80 年代、90 年代文学思潮	91
第一节 80 年代文学思潮	91
第二节 90 年代文学思潮	97
第七章 80 年代小说	103
第一节 80 年代小说概述	103
第二节 王蒙 陆文夫 高晓声	109

第三节 谌容 张贤亮	112
第四节 汪曾祺	115
第五节 探索小说 莫言	117
第八章 90 年代小说	123
第一节 90 年代小说概述	123
第二节 贾平凹 陈忠实	128
第三节 王安忆 陈染	133
第四节 王小波 王朔 余华	136
第九章 80 年代、90 年代诗歌	144
第一节 80 年代、90 年代诗歌概述	144
第二节 朦胧诗	148
第十章 80 年代、90 年代散文	155
第一节 80 年代散文概述 《随想录》	155
第二节 90 年代散文概述 《文化苦旅》	158
第十一章 80 年代、90 年代戏剧	162
第一节 80 年代、90 年代戏剧概述	162
第二节 沙叶新 高行健	170
第十二章 80 年代、90 年代台港文学	177
第一节 小说	177
第二节 戏剧	182
第三节 散文	184
第十三章 2000—2013 年小说 (一)	188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概述	188
第二节 精英写作的坚守	194
第三节 莫言	199
第十四章 2000—2013 年小说 (二)	206
第一节 通俗小说	206
第二节 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	210
第三节 “80 后”青春写作	211
第四节 新媒体与文学新形态	214
第十五章 2000—2013 年诗歌 戏剧 散文	218
第一节 诗歌	218
第二节 戏剧	220
第三节 散文	225
当代文学大事记 (1949—2013)	229
新版后记	240

下 编
(1949—2013)

第一章 1949—1976 年文学思潮

第一节 50 年代、60 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形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重新塑造了中国文学存在与发展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50—70 年代，中国文学在谨严并不断趋向纯粹的革命文学规范制约之下，以高度的体制化形态呈现出与 20 世纪上半叶迥然不同的面貌。主导 50—70 年代中国文学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人学观念：视阶级性为人的本质，以阶级取代个人，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判别人的身份、地位与性质，并满怀信心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来完成对于人的种种文学想象；它试图终结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对于人的多样化探索，以及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多种人的观念及其文学书写之间的对话、交流。

一、第一次文代会：当代文学的起点

1949 年 7 月 2 日至 19 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举行。会议出席代表 824 人，毛泽东到会讲话，朱德致贺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会议由郭沫若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茅盾总结国统区文艺运动，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会议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会后，又陆续成立了下属的各个协会。其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为中国作协）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文联与作协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组织、实施文艺运动的重要机构。文联与作协历届全会的报告、决议都在政治方向与价值选择方面具有示范性、主导性的指向。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中国作协实行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种会员组织方式。团体会员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作协，以与国家行政建制同构的方式保证自上而下的组织功能。对于作家个人来说，经审批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以及在其中担任相应职务，具有身份认定和艺术价值评价的重要意义，对作家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具有重要的实际影响。中国文联以及中国作协等的成立，意味着新中国的文艺家都将成为党领导下的文艺组织的成员。

中国当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生成、发展起来的新文学，它的历史接点是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文学。分析 40 年代文学状况与性质，并进而厘定新文学历史发展的方向，就成为当代文学路线展开的首要任务，这也是长期由主流政治所主导的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起点。40 年代，由于持续的战争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分裂，中国社会被分割为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抗战时期为根据地）。国统区文学承续了五四人的文学传统，呈现多元状态，解放区文学则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指导纲领，以工农兵文艺为旗帜。茅盾和周扬分别就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所作的总结报告，具有清理文学传统、划分文学等级、明确文学方向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茅盾的报告在有限肯定国统区文学成就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其中的“缺点”以及“毒素”。缺点，主要是一种“低回感伤的情绪”，它在取材一般生活现象的客观型作品与着重描写人物精神状态的主观型作品中都存在，尤其是那些“填塞”着“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有害的倾向潜生在进步的文艺阵营内部，成为腐蚀我们的斗志的毒素”，主要包括向“小市民的趣味投降”的“完全按照个人的趣味而采集些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的作品，“迎合落后的读者”的“抗战加恋爱的新式传奇”，以及“受着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公然把颓废主义呈现在大众的面前，而且还要装出‘纯文艺’的高贵的气派来骗取读者”的创作。这些不良乃至有害倾向之所以产生，除了客观条件之外，最根本的是“作家主观上的原因”，即“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未经改造”的他们“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他们在艺术上倾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也妨碍了他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①。

周扬关于解放区文学的报告以高昂的激情与不容怀疑的自信阐明：“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这不仅体现在创作上“像潮水一般地涌进”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语言”，以及“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的新的形式，也表现在由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参加的新的文艺生产方式。此外，改造“尚在民间流行的封建旧文艺”的旧剧改革，也是一项具有全新意义的实践。周扬的报告在总结解放区文艺经验与成就的同时，明确宣布以《讲话》精神所规定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②

两个报告反正对照，又殊途同归，全面而具体地厘清了作为当代文学直接历史起点的 40 年代文学状况，厘定了判别文学价值的标准，明确了发展方向。随着即将发生的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根本转变，延安文学作为正统和范例，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第一次

^①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引自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5 页。

^②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3 页。

文代会拉开了当代文学的大幕。

二、持续不断的文学运动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本时期上升为文学与所有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关系,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是“十七年”(特指自194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十七年”)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也是“十七年”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与实际目的。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强调文学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性,强调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的原则”,明确了文学事业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关系与位置:“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①“十七年”文学中连续不断的批判、斗争形成的文学运动,就是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的集中体现。

关于《武训传》的“讨论” 1950年年底上映的历史题材传记电影《武训传》,通过武训行乞求学、进而兴办“义学”的事迹,歌颂了反映“旧社会贫苦农民文化翻身的要求”的“武训精神”^②。影片开始受到了不少肯定,但很快,《文艺报》发表贾霁的批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修订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将其定性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投降”。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随之展开。1951年8月8日,周扬发表《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这场批判进行了总结。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是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史上一个重要起点。邵荃麟在1959年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历程时指出:这是“开国后文艺界第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的斗争”^③。

电影《武训传》的一个关键是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如何表现知识分子、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也是要被严格规范的。与此相呼应的,是1951年还发生了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这部家庭生活、婚恋爱情题材的小说,由于一定程度地展开了知识分子身份的丈夫与工农出身的妻子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复杂性,被认为是表现了“反人民的态度”“新的低级趣味”^④,具体说,就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⑤,迎合了“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⑥。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页。

② 孙瑜:《编导〈武训传〉记》,《光明日报》1951年2月26日。

③ 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邵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

④ 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4卷第5期,1951年。该文发表时署名“李定中”。

⑤ 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⑥ 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报》第4卷第8期,1951年。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作为新红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俞平伯于1952年出版了旧作《红楼梦辨》(1923)基础上修改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又发表《红楼梦简论》,总结了自己的红学研究。不久,李希凡、蓝翎连续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与《评〈红楼梦研究〉》,批评俞平伯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思想以及对《红楼梦》的“歪曲”。文章很快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于1954年10月16日致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出,要开展一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8次联席扩大会议,讨论《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问题。最终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①,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会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冯雪峰被迫发表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 error》(《人民日报》1954年11月4日)。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延续了“讨论”《武训传》时的方式、方法,即以具体作品为契机和引子,展开具有敌我关系性质的思想斗争。“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对古典作品评价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一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大斗争。”批判目标直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胡适,其目的是为了铲除“几十年来胡适思想的老根”^②。这不仅涉及如何解释现代文化史的问题,更关系到长期以来的革命的性质及文化领导权的根本问题。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是左翼文学阵营的重要文艺理论家。40年代后期,针对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文学主张,左翼文学界曾展开过一系列批评。1952年文艺界整风期间,6月8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成员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并以编者按首次提出“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小集团”,指明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2年12月,全国文联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林默涵、何其芳分别在会议上作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④与《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⑤的发言。胡风等并未因此更正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路翎在其《洼地上的“战役”》^⑥等小说受到严厉批评后,发表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⑦,展开自我辩护。1954年7月,胡风直接向党中央递交《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计27万字,故又称“三十万言书”,也简称“意见书”),批评文艺界在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文艺题材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称之为“五把刀子”。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一批舒芜提供的与胡风之间的私人往来书信。接着,又连续公布了第二、三批材料,^⑧胡风等人被最终定

① 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② 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邵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页。

③ 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

④ 后发表于《文艺报》1953年第2期。

⑤ 后发表于《文艺报》1953年第3期。

⑥ 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3月。

⑦ 连载于《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与第3期、第4期。

⑧ 第一、第三批材料公布时,毛泽东均亲自撰写按语,后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毛泽东选集》。

性为“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最终导致2100余人被牵连,92人被逮捕,62人被隔离,73人被停职反省。对此,作家袁鹰后来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这桩共和国第一个最大的文字狱,从此开了一个最恶劣的先例:以言论定罪,以书信定罪,以文字定罪,甚至以闲谈定罪。片言只语,便无限上纲,穿凿附会,便罗织罪名。一纸公文,便可以在一夜之间动员全国舆论媒体,呼唤来千军万马。”^①

“双百”方针与文艺界“反右运动” 为了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团结,1956年5—6月,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②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双百”方针与《讲话》保持高度一致,具有明确的限度和前提:第一,“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

“双百”方针提出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文学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新异色彩。这不仅体现在理论上关于现实主义、写真实的讨论,关于人情、人性、“文学是人学”的思考等;更直接表现在“干预生活”口号下出现的直面现实矛盾的小说、特写、杂文与戏剧,以及把笔触伸向人情、人性,探索人的内心复杂性的一批创作。《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刘绍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何直)、《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陈涌)、《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周勃)、《要不要“干预生活”》(晨风)、《话剧演员要求创作民主》(方焰)、《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黄药眠)、《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唐挚)、《论人情与人性》(王淑明)、《刺在哪里?》(秋耘)、《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电影的锣鼓》(钟惦棐)、《论人情》(巴人)等一批文论的出现,表达了对诸如现实主义真实性与典型性、文艺创作中的人情与人性、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生产规律与领导体制、歌颂与暴露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等多方面问题的兴趣与论争。在文学创作方面,主要有两类具有新异色彩的作品。一类是直面现实矛盾,大胆“干预生活”,突破了长期以来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选》《田野落霞》《爬在旗杆上的人》《本报内部消息》等。另一类是突破被长期封锁的人情、人性的禁区,把笔触伸向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有《在悬崖上》《美丽》《小巷深处》《红豆》等小说,以及《布谷鸟又叫了》等话剧。

“大鸣大放”为期不长。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胜于不久前的反胡风案。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并接连发表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号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迅速展开。“当年十月反右结束时,全国共划

^① 袁鹰:《书窗碎影之六:五十年前那场文字狱》,《书摘》2003年第12期。

^② 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各界人士发言讨论之后,他在总结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应中科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邀请,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科学家和文艺家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

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另有不少人未‘戴帽’而受到被开除党籍、团籍和降职降薪等处分。”文艺界是“反右运动”的重要领域，“仅全国文联和各协会领导机关里，就划了八十七名‘右派’。其中中国作协一个人数不多的机关里，被定为‘右派’的竟达三十人，受到党纪、行政等处分的还未统计在内”^①。对于作家、理论家来说，他们的历史问题以及在“双百”方针形势中的表现，成为“揪毒草”、划右派的依据。1957年7月至9月，中国作协连续召开了25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艾青、苏群、白朗、罗烽、吴祖光、钟惦棐、傅雷、陈梦家、孙大雨、穆旦等一大批老作家，因为历史或现实问题，被划为“右派”。青年作家王蒙、刘绍棠、陆文夫、李国文、邓友梅、从维熙、张弦、张贤亮、方之、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等也被批判和“戴帽”。“干预生活”“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以及写人情、人性的理论探索和文艺创作，由“百花”而被定为“毒草”，“百家”也被简化为“无产阶级一家”与“资产阶级一家”的两家。1958年第5期《文艺报》上，周扬发表了对文艺界“反右运动”具有总结性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后来，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他曾回顾当时的历史：“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况更为严重，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文艺领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遭受了挫折。”

从文艺大跃进到“文革”前夜 1958年，与经济上的大跃进相呼应，文艺“大跃进”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当时发起了一场新民歌运动，广泛收集民歌，号召全民写诗，1959年编辑出版的《红旗歌谣》是其成果的体现。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民歌与两结合，体现了意欲创建“共产主义文艺”的意义。郭沫若、周扬在《红旗歌谣·编者的话》中就宣称：“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文艺报》在综述当时关于“两结合”讨论的文章中也指出：“党中央提出建设共产主义文艺的任务，《人民日报》并在九月三十日发表了题为《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的社论，使我国工人阶级文艺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建设共产主义文艺，已成为广大群众和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实际行动和奋斗目标。”^②

狂热的大跃进之后是连续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作为两结合实践的新民歌运动也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实绩。1960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也对激进的文艺政策作出调整。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新侨会议”），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也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论述了发扬艺术民主、尊重文艺规律、物质生产

①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6、329页。

② 《各报刊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文艺报》1958年第21期。

与精神生产等问题。中共中央根据这个精神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八条》）。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國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评价与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同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指出要重视写好“中间状态”的人物。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并针对小说《刘志丹》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一场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内展开。八届十中全会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在1963年年初提出了“大写十三年”，认为只有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三年的现代生活，才能“帮助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己为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思想”。继而，姚文元、张春桥又进一步对此进行发挥，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是社会主义文艺。题材决定论被推向极端。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作出两个批示，彻底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界，掀起了新的批判高潮。1964年文艺界再度整风，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小说《三家巷》《苦斗》《赖大嫂》《陶渊明写挽歌》等，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新编历史剧《李慧娘》《谢瑶环》《海瑞罢官》等被批判。这一时期，社科界配合中共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在国内批判“合二而一”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真实论”、“有鬼无害”论、“写中间人物”论、“题材问题”的批判，是文艺界引人注目的理论事件，日益强化的阶级斗争思潮弥漫于文艺领域。小说《艳阳天》《风雷》，戏剧《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诗歌《重返杨柳村》等一批宣传阶级斗争的作品产生。1964年6月，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一批革命现代京剧登台亮相。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的序幕。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主流创作方法、艺术形态和文学理论被提倡，同时也具有改造与重塑作家的世界观、美学观的特殊意义。它在当代的根本指向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新文学形态的构想，包含着非常鲜明的理想色彩与乌托邦意味。当代的现实主义其实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规范机制，成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阐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时，就“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195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周扬在1952年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所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是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当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会议正式确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